



【深圳记忆】

第二天早上过去证券公司一看,还是让人吃惊不小,满地都是脱落的鞋、衣帽和手袋,还有快餐盒、胶袋等垃圾,可见当时人挤得是那么惨烈,而自己全然不觉得危险,后来回想才感到有点后怕。

92股潮——站直了,别趴下

编者按: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深圳风华正茂。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5周年。本报特推出《深圳记忆》栏目,纪念生生不息,敢于破旧立新的深圳精神。

张伟彬

1992年深圳股票风波,我是亲身经历者,幸运的是我不仅现场感受了股潮的汹涌,而且还第一时间排队成功,用七张身份证换到了七张抽签券,成为92股潮之幸运儿。后来才知道,我排队的那天最少有100万怀揣发财梦的准股民,带着上千万张身份证来到深圳各证券点排队“挖金”,争先从疯狂的股市中突围。

那时我在深圳宝安区鹤洲村打工,不知股票为何物,更不敢肯定这东西一定赚钱,仅仅因为大哥要我排队认购抽签券,我便请假了,提前一天

准备好行当,养精蓄锐,盼望能成功排到一个名额。

对于那天排队认购的记忆,只能用悲壮和惨烈来形容。如果用电影来形容,那就是《站直了,别趴下》!但历史也告诉你,也别站得太直,否则就有可能挨竹杆的。

1992年8月9日一早我便步行至宝安证券公司。好家伙,一个小小的证券公司前面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只能老实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排队,男男女女的排队大军,无不眼泛金光,都是陌生的面孔,我一个也不认识。

好在自己年青力壮,身手也算灵活,手里紧抓着包括老家借来的身份证七张和七百元现金,心里一点也不慌乱,自恃力气大,完全不用担心被挤压成肉酱饼,只是担心来太迟,太靠后没有机会领到认购表。那时一张身份证只能换购10张股票,每人最多拿十张身份证。而那天好像听到那个点只分发一百张认购表,而到来的人却人山人海,简直难以计数。

随着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后面的人一看队伍长度,好像没有机会了,便有几个人故意使坏,在后面一齐推搡队伍,多米尼骨效应倒了一大片,受害者骂声一片,但推人者却装作自己也是受害者,佯装正义地说,后面的不可以这样啊!队伍被这样捣乱几次后很快就乱了。加上安保人手不够,经验也欠缺,既没有设排队区,也没有分隔栏,场面乱得一塌糊涂。

维持秩序的保安见势不妙,跑到我排的两队前,大声喝令就排这两队,

其他队无效,很幸运我就这样稀里糊涂被定格为前几十名了。其他队反应快的,没等保安说完,便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我们两队的后面排,当然也有不守纪律的往前插队,硬是被保安拉出队列,吆喝到后面。

为防止队伍再次混乱,保安又命令大家要蹲下去,谁也不可以站起来,但喊哑了也不起作用。人挤人都挤得变形了,哪里还蹲得下去!另外谁也不会这么傻,贴得这么密的人,要是就这样蹲下去就有被踩伤或踩死的危险,所以大家干脆就这样半蹲半站着。

保安见众人不服从指令,不知何时手里多了一条约八九米的长竹杆,两三个手指粗,那架势够吓人的。那些捣乱的一看来真家伙,有所收敛。但很多人因太挤蹲不下去,被打得头起包,手受伤,有些简直是伤痕累累,真有点冤了。保安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看到“鹤立鸡群”的,便一杆子使劲打下去,打下去的网兜我猜百米外都能听到,有时一杆下去能打几个人,竹杆打偏,伤及无辜者肯定是有。几分钟下来有十多个人被打,为免被打到头,有些人用手挡,手都红肿流血了。受伤的虽觉得冤枉但也要忍受着,如果与他们闹翻了,眼看到手的好处就只能打水漂了。

幸好我个子不高,又在靠近队伍的前面,离保安近在咫尺,长竹杆自然就不会伤到我。

由于天气炎热,没几分钟,我手心里的钱已被汗水浸湿了,身子悬在紧密结实的人墙中。因太挤,蹲不下也站

不直,只能弓成一个驼背似的,贴在别人身后,大家也就无暇顾忌男女性别了,前身贴后背,紧紧地“抱团取暖”,有点贴身肉搏的味道,大家明白,非常时期顾命要紧!时间长了,站得太累时,看到竹竿走远了,偷空站直一两秒钟就算是最好的休息。我试了几次两脚离地,玩“悬空打盹”,都宣告成功,真是奇了!创了自己排队挤压的吉尼斯纪录。这样“别致”的休息方式,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有点好笑了。

因人山人海,为防小偷,大家都把证件钱包紧紧抓在手里,鞋子有百分之九十都不是你自己的了,有的人挤掉剩下一只鞋,有的人两只鞋都挤没了。一旦鞋没有绑稳的,掉了就掉了,再也找不回来,被踩掉的占大部分。掉鞋的还算幸运,最倒霉的挤得钱包证件都没了,甚至有些被挤得受不了,自己主动退出这人肉搏战。

只要是有人搞恶作剧,女人便尖叫“救命”、“非礼”,男人也高呼“死人啦”,呼救声此起彼伏。许多被挤得面无人色,有一个女的被挤得窒息倒地,好在旁边的人发现高喊“死人了”,大家及时让开身位,让保安扶着护送出去,退出这场残酷的股票争夺战。

很幸运,两列队伍虽挤得有点歪歪斜斜,但总算形成了比较稳定的S形,我瘦小结实的身影就被定格在这股票历史蛇形队伍中。

看着队伍差不多稳定了,前面便引导发放认购表,轮到到我,我用颤抖的手推开被汗水浸湿的七张百元大钞和七张身份证,终于领到来之不易的

股票认购表。在我领表后不久,证券公司便莫名其妙地宣布发放完毕,紧闭了大门。很多人都提出抗议“太不公平了”!辛辛苦苦排了这么长时间,有些还是舟车劳顿从老家长途跋涉赶过来的,甚至差点送了老命,怎么说就没了呢!他们吵闹了很久也不肯散去。

晚上就听到市内有人去深南大道政府机关门前游行示威,但后来市政府宣布再发行50万张认购抽签表,才算平息了这场闻名中外,惊动党中央的深圳股票风波。

第二天早上过去证券公司一看,还是让人吃惊不小,满地都是脱落的鞋、衣帽和手袋,还有快餐盒、胶袋等垃圾,可见当时人挤得是那么惨烈,而自己全然不觉得危险,后来回想才感到有点后怕。听说有一个孕妇被挤流产了,还差点送了命。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经济改革要实验,股票市场要实验。当1990和1991年大家还为要不要筹备资本市场争论不休时,邓小平的92南巡讲话“证券,股票这些东西不是资本主义流入,没有风险,能不能用,允许看,看对了,一两年放开,错了关也有关的办法”,让深圳人有了先行先试的勇气。而深圳发行股票抽签券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笼的。

虽然在具体发行过程中有点小闪失,但总的来看,它对深圳乃至中国证券事业的影响还是积极和深远的,它为后来上海等城市的股票发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系深圳作家)

行业协会岂能变为“二政府”

刘武俊

民政部新近发布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任职管理办法》提出: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不设定行政级别,不得由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公务员兼任。《办法》圈定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是各级行政机关或参公单位主办、主管、联系以及与其挂靠的行业协会商会;二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法人,且会员为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的组织,少数发挥特殊作用、具有特殊功能的行业协会商会暂不在调整范围内,比如工商联。

笔者认为,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得动真格的,对于继续违规兼任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的官员应当予以问责,否则就难以遏制行业协会商会继续沦为“二政府”和“权力掮客”的可能。

“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协会。”仅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官网公布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就多达106个,多数行业协会商会都有现任或退休部领导“挂名”任职,有的居然多达10余人。《办法》落地后,至少有百名部级高官将离开协会、商会。此前出台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已经

明确提出,要对已在行业协会商会中任职、兼职的公务员进行一次性清理。

行业性的协会、商会,其负责人本就应该由公认的行业领袖担当,而不该成为退休官员俱乐部。现实却是,官员退休之后到行业协会、商会任职,早已成为安排退休领导干部的惯例。针对这一情况,《办法》特别规定,领导干部(离)休后三年内一般不得到行业协会商会兼职,个别确属工作需要要兼职的,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审批。经审批获得兼职资格的离退休干部,不得在兼任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其他额外利益。

“去行政化”是行业协会商会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许多原先由政府承担的职能逐渐为行业协会商会所替代,部分审批权力无疑也将交还行业协会手中。倘若继续沿袭庞大的行政机构来维持运行,势必让行业协会商会成为“二政府”和“权力掮客”。

行业协会行政化滋生的腐败问题几乎就是“睁眼瞎”,看也跟盲看一样,有必要引起警惕。中国畜牧业协会秘书长沈广利用开办各种展会的名义,私自截留会展收入,侵吞会员参展费,共贪污协会公款1200余万元;四川省工程爆破协会常务副会长李荣聪,将

其任子安排在协会做出纳,将亲朋好友安排在办公室任主任,其非法收受1500万元赃款大多数都是通过协会开发票、做账,实际上把协会当成了转移受贿款的“中转站”;深圳市自行车协会执行会长黄恒律,为了减轻自行车带来的环保处罚问题,先后多次向南山区环保局监测所监察二队队长和南山区环保局监测所所长李峰行贿。

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大势所趋。长期以来,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政社不分、管办一体、责任不清的问题,是社会组织改革“要啃的硬骨头”。

转变政府职能的要义,就是将一部分政府管不了、不该管、管不好的社会问题还权给社会,鼓励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从政府中转移出来的职能,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政府的某些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核心就是政府放权,很多公共事务需要区分,那些社会能管好的,政府就别再管

了,大胆“放权”给社会组织。当然,在放权的同时,要培育好社会组织,防止其蜕变成“二政府”。

坦率地讲,当前各地不少行业协会大都和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直接从行政部分分离出来,管的事情和政府差不多,行业商会还可以打着社会组织的名义名正言顺地收费谋利,成为政府官员的“养老院”,不少政府领导退休后就被安排去行业协会任职。这种“二政府”的怪胎早已为社会所诟病,其中衍生的腐败现象更是为群众深恶痛绝。

行业协会必须尽快实现“去行政化”,让这些社会组织的人、财、物和政府部门完全脱钩,把所谓“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都名正言顺地回归社会,培育成为真正意义上民间性的社会组织。政府公务员退休后,不得再到自己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任职,实行严格的任职回避原则。行业协会的主要领导原则上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择优选聘。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但绝不是把公权力延伸到社会每个领域,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角色定位上讲,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就是要逐步从“万能政

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撑船”转变为“掌舵”。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另一方面则要大力培育成熟发达的社会组织,加快社会建设。惟有政府和社会各得其所、各就各位,政府职能转变才可能真正到位。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有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但绝不是把公权力延伸到社会每个领域,而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从角色定位上讲,政府职能转变的目的,就是要逐步从“万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撑船”转变为“掌舵”。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另一方面则要大力培育成熟发达的社会组织,加快社会建设。惟有政府和社会各得其所、各就各位,政府职能转变才可能真正到位。

行业协会负责人不设定行政级别,不得由官员兼任,是行业协会“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有望遏制行业协会沦为“二政府”和“权力掮客”的乱象。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得动真格的,对于继续违规兼任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的官员应当予以问责。

(作者系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



【说法不武】

行业协会负责人不设定行政级别,不得由官员兼任,是行业协会去行政化的重要一步,有望遏制行业协会沦为“二政府”和“权力掮客”的乱象。

契约精神不是敝屣

木木

二十年前,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与几个长久未见面的朋友相约,在北京西苑饭店附近的一个烧烤店小聚。

小店面积不大,由于所处位置比较僻静,所以客人也不多。刚进店落座的时候,大家都忙着相互“嘘寒问暖”,也就没人注意店里还有其他什么客人。但没过多久,小店里最里面不时发出爆笑的一桌客人,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三个年轻人正围坐在桌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两个身着G队的球服,另一个着便服,但左腿打着石膏绷带,横担在身旁的一张凳子上;三人手上都夹了烟卷儿,不时地猛吸一口,然后有点儿夸张地把烟雾吐向半空;尤其让人“艳羡”的是,每个人身边儿,还各坐了一位浓妆艳抹的女郎……

【缘木求鱼】

如果一个球队的老板为了钱、为了利益,都能置道德脸面、契约精神于不顾地胡搞,又有何颜面约束球员,禁止他们胡搞呢?

朋友中有两位是足球爱好者——也仅仅是普通爱好罢了,其中的一位,突然就压低了嗓子说,哎,你们看看,那个好像是G队的某某某啊!我们这几个外行在足球队员面前几乎就是“睁眼瞎”,看也跟盲看一样,但另一个行家仔细看了看,就很肯定地表示赞同,没错儿,就是他!旁边那个是某某某,那个折了腿的,不认识。

在那个年代,中国好像还不太流行追星,或许也是因了名人脑袋上光环的亮度还不是特别大的缘故,那两个爱好者也仅仅是眼中亮了一亮——大概的意思约等于“哟,今儿见着真人儿了”。不过,亮过之后,就开始大摇其头,一边摇头一边小声地骂:(此处略去脏字若干)又抽又喝,怎么能踢得动球!

拜那次“邂逅”所赐,本人后来就

基本不再看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一直搞不过外国人,原因虽有不少,但球员比较“差劲”,却绝对是个极重要的原因。在这个“差劲”里,除了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外,还有身体素质、意志品质的巨大差距。

踢足球,既是技术活儿,也是力气活儿,更是精神活儿!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想从本质上提升中国足球的形象,让世人给予其最基本的尊重,恐怕每一个球员都必须在这三个方面下点儿苦工夫。这是一切努力的基础,而要想在这三个方面有所长进,显然要首先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靠身体素质吃饭的人,如果连像烟酒这样的小诱惑都扛不住,不能不说其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出了大问题。

而一个球员的职业操守有了问

题,很难想象其踢球时能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品质来。这么多年来,在关键场次、关键时刻,偌大的一支中国足球队屡次上演全线崩溃的活剧,究其根本,问题还是出在职业操守上。试问,一个在小事情上都管不住自己的人,管不住自己的嘴,管不住贪得之心,又怎么能经得住大事的考验。

必须承认,中国球员身上的问题,除了其自身的原因外,球队的管理层显然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大约球队对球员就根本没有认真的要求。也是,如果球队老板自己都要经常性地忍不住就乱来一下,又怎么能对队员有相应的要求呢?即使要求了,也一定是装人,如果连像烟酒这样的小诱惑都扛不住,不能不说其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出了大问题。

正所谓上行下效,有什么样的将

领,就一定有什么样的军队。这一点,古今中外,早就验证了无数次。如果一个球队的老板为了钱、为了利益,都能置道德脸面、契约精神于不顾地胡搞,又有何颜面约束球员,禁止他们胡搞,又怎么能奢望球队能夺得国人的期望和重托。

前几天,广州恒大戏剧性地再次夺得亚冠。网络上马上就有好事者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让这支队伍代替国家队出征,肯定能夺下那张珍贵的“入场券”。不过,假设从来只能是假设。如此意淫出来的假设到底靠不靠谱儿,人们或许能从恒大老板许家印身上略见端倪。一个视承诺、视契约精神如敝屣的商人,居然也能带出来一支令行禁止、无坚不摧的铁的队伍来,本人寡陋,还没听说过。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